

三资企业发展面临的战略选择与调整

Strategic Option and Adjustment of Triad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慕海平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北京 100824)

改革开放以来,三资企业作为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特别是1992年以来,在国际资金供求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三资企业的势头却异常迅猛,形势令人鼓舞。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越是需要对其发展的方向和结构加以引导,否则很容易加大未来调整的成本,三资企业的发展也是如此。笔者认为,90年代仍然是我国三资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调整时期。三资企业的发展要上新台阶,必须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以及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协调等方面下功夫,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进一步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

要注意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克服单纯追求规模扩张的倾向,使外资的投入结构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 and 结构的变化方向相一致。

8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很快,80年代初每年实际金额约在10亿美元左右,90年代初期则超过近40亿美元的水平。1992年获得突破性发展,达到113亿美元,首次超过对外借款(79亿美元)。外商对华投资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实行鼓励外商投资的开放政策,在体制和战略方面为外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是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资金缺口较大,潜在的市场容量逐渐地释放为现实需求,带动了外商投资;三是我国人力、土地、资源等基本投入要素价格较低,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明显,对外商投资有很强的吸引力。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新增直接投资较多的地区之一。

但是,三资企业发展的结构分布比较集中,初期主要是在宾馆旅游业,之后迅速扩展到制造业,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从我国产业结构成长的内在逻辑看,近十几年是我国制造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我国一直实行生产资料部门的优先增长的发展方式,消费品工业发展相对不足,市场潜力很大。这样,外资在进入我国市场时,首先选择了消费品工业,利用其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从最终产品开始,逐步扩大投资规模。从目前的统计结果看,三资企业中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约为3%、81%、16%,其中基础产业与制造业的比例为1:9。在制造业内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向后者倾斜非常明显。

三资企业的结构特点,符合我国前期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因而其发展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如果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三资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必然会面临着规模与结构的平衡和选择问题。主要表现:一是从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成本低廉的角度出发,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具有吸引外资、扩大规模的优势。同时,我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较低,加工业的扩大必然会引起国内资源的硬约束,从而必须考虑利用国际资源的问题。二是如果将资源战略部分地转向国际市场,则需要有更多的外汇储备支持,也就是说要扩大出口。目前,我国出口的主要力量来自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这些出口品的附加值较低,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因此,长期实行对这类产品的出口倾斜,也会遇到许多障碍。三是依靠内部的挖潜升级,来解决资源约束和出口能力问题。通过结构调整,降低加工业资源消耗系数。同时,加快对加工业投入品和中间品的国内替代,降低最终产品的进口系数,进而达到加工业与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这一选择要求我们加快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加强技术要素的投入,从而改变过份依靠传统加工业以求发展的倾向,实现结构升级,转换增长方式,以此达成利用外资的规模与结构的平衡。

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通过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快理顺两个市场的关系,消除三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利益差别,进而为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外商来华投资,除了考虑到投入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瞄准了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购买力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容量的扩大,使任何谋求发展的国外资本,都不能不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目前的问题是,我国的市场体系及其运行规则很不完善,外贸体制的改革也不到位,从而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能很好地融为一体。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讲,突出地表现在:一是市场准入问题。我国出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的考虑,对于相当多的投资领域仍有限制,开放程度还不够,这使得许多国外投资者在我国市场上缺乏一种综合运筹的经营条件,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投资意愿,直接影响到投资规模、结构和长远发展。二是市场规则问题。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发育很不完善,外商进入我国之后,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部门,经常遇到不同的市场规则(办事规则),无形中增加了经营的难度,提高了交易成本。甚至有些外国商人,不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对华投资,相反却将着眼点放在利用不规范的市场,进行投机盈利上。这无疑有悖于我们利用外资的初衷。三是汇率制度问题,目前,我国存在着三重汇率:官方汇率、调剂汇率和黑市汇率,而且汇率差价较大。人民币与国际货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国内外普遍认为,按官方汇率评估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已经大大贬低,但从调剂市场的比价看,人民币还呈贬值趋势。从现实的可能性看,稳定人民币的币值并逐步统一汇率还需有一个过程,这是造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隔层的重要原因之一,短期内难以克服。汇率制度的这种现状给三资企业的发展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影响外资的投入,外资按官方汇率折算成股本金,在外商看来,等于低估了其所占的份额;另一方面,影响三资企业的经营成本核算。三资企业作为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品也要面向出口,但目前的汇率差别,使得出口不如内销,为了保证出口和必要的进口,三资企业的效益将会下降。

为了使三资企业健康地发展,我们必须从政策上协调好两个市场的关系,进而使市场与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任何经济的发展,总量和结构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体制和机制,这是总量和结构成长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步伐,统一国内市场体系,完善市

场运行规则。在这一过程中,外贸体制要抓住“复关”的有利时机,加大改革力度,尽快破除两个市场的隔层现象,从而为三资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

三、提升管理水平, 兼获有形和无形效益

根据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总要求,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使引进外商投资的有形效益和无形效益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引进外资,发展三资企业,目的在于多方面地获得经济效益。十几年来,三资企业发展的有形效益很明显。据统计,1980~1992年我国累计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近400亿美元,每年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2.8%提高到8%以上,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建设资金的缺口。1992年批准三资企业总数达到4万多家,吸收就业人数大幅度提高,完成出口创汇174亿美元,为国家提供税收107亿元。所有这些有形的效益,使三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从理论上讲,发展三资企业不仅要追求有形效益,更要追求无形效益,特别是经济发展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情况尤其如此。吸引外资是同技术和管理连在一起的,而技术和管理又是利用外资效益的关键和基础。我们把由利用外资而引起的技术的扩散、管理水平的提高、观念的改革、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均看作是无形的效益。如果只将政策的注意力放在资金的规模和项目的数量上,而忽视无形效益问题,这样的外资政策就不能算是成功的。

毋庸讳言,我国三资企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主要还是一条数量型的道路,如果说有效益的话,也主要集中在有形效益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技术和人力等要素总体水平的限制,主要矛盾是有形效益问题,而无形效益在利用外资初期很难充分地发挥出来,有时其作用也往往是无意识的。但就我国现有三资企业的规模和水平而言,无形效益已经成为首先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发展三资企业,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获取无形效益。一是在宏观上,应注意落实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政策,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和推广,竭力避免引进外资在技术上的盲目性。二是在管理上,应以三资企业为媒体,通过总结、移植和嫁接等途径,逐步将不同特点的管理方法融入我国的企业管理之中。欧美企业的技术开发、日本企业的严格管理和港台企业的市场营销等等,对我国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三是在人力上,

应完善三资企业的劳动保护、教育培训和社会保险等配套措施,使三资企业的发展不仅给国家带来财政收入和工资收入等积累,而且也长期发展创造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积累。四是在观念上,不仅要三资企业当作一种企业形态来管理,更应提升到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来管理。也就是说,应从社会、文化、生活和区域规划等诸多方面来安排三资企业的发展问题,一方面,逐步消除政策差别,落实三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通过为三资企业创造发展的社会环境,进而促进我国的社会经济管理向国际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四、发展跨国经营,追求创造效果和转移效果

鼓励吸引外资与发展跨国经营并重,以“引进来”为起点,以“走出去”为目标,逐步将我国的对外开放从贸易平衡阶段转向要素平衡阶段,尽可能地大跨度配置资源,同时追求创造效果和转移效果。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利用外资也不例外。8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得到同步发展,但外贸的目标主要是扩大出口创汇,而利用外资的目标则偏重于引进。迄今为止,这种战略实施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效果看,近几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和利用外资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收益却反而不断下降。主要表现在,外贸出口的数量增长远远快于收汇的增长,而利用外资规模的增长也高于税收的增长。这说明,数量增长的战略已经不适应现有规模的需要,对此必须做出调整。

笔者认为,调整应是战略性的,其基本方向应根据对外开放的阶段性变化,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并主动地、全方位地向国际市场出击。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将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通过必要的对外投资,扩大跨国经营的规模,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运筹能力。这同时意味着,利用外资战略是整个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利用外资战略的阶段性调整,需要多种手段进行综合配套。

从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和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现实可能性看,发展跨国经营应主要解决国际流通领域的问题,建立起联系广泛的国际营销体系,为国内的经济提供必要的进口资源,并为产品的出口打开销路。仅从三资企业发展的角度看,目前外商以划拨价格机制转移利润的现象比较普遍,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我方缺乏跨国营销的手段。因此,通过发展跨国经营,可以更好地掌握国际市场,进而避免过多的利益流失,这已成为巩固和发展三资企业成果的重要环节。

发展跨国经营的必然结果是带来更大规模的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使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达到更高的水平。根据现代国际经济理论,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将产生创造和转移两种不同的效果。应该说,近期我国利用外资同外贸一样,开放的收益主要表现在转移效果上。我国外资的主要来源集中在亚太地区,其投入中国市场的主要动力是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我国成了吸收该地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场所。在这一转移的过程中,我国获得了一部分利益,经济规模也扩大了。但从三资企业出口看,我国获得的实际效益是有限的,对某些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被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逆差所抵销,形成了效益的转移。一般讲,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规模较小,分工与合作带来的创造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从这种意义上讲,发展跨国经营,加强资金的双向流动,一方面旨在挖掘现有产业转移中创造效果的潜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取转移效果和创造效果的两重利益。

五、正确处理内向替代与外向替代的关系

在调整对外开放布局的基础上,处理好内向替代与外向替代的关系,实现区域间专业化分工,将利用外资引向空间相对均衡的发展轨道,尽可能地提高三资企业发展的整体效益。

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实行的是地区倾斜政策,赋予了东部沿海地区许多特殊的政策和条件,加上这些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较强的经济基础,所以迅速形成了由若干次区域组成的繁荣经济带。在这一过程中,三资企业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这种地区倾斜式的开放布局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但是若疏于宏观政策的引导,长此下去,就会引起经济布局内在关系的失调,最终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就目前的情况看,开放布局的倾斜在利用外商投资问题上造成了两方面的不合理现象。一方面,表现在外商投资的结构上,形成了加工业发展过于集中及区域间专业化分工不清等问题。其直接后果是加重了东部沿海地区现有资源承载的压力,而同时内陆广大的资源腹地的优势却无法发挥,以致使沿海与内陆的产业结构趋同,出现过度竞争、效益下降的情况。另一方面,表现在吸引外资的方式上,各地竞相出台优惠政策,拼命争上开发区,造成政策大战,自相竞争,使外商从中渔利。同时,造成开发区功能雷同,削弱了宏观调控的能力,弱化了区

(下转第16页)

3. 利用海外技术公司促进技术出口

美国麦斯塔国际工程公司是国际上著名的冶金设备设计公司,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全套轧钢机械和冶金辅助设备。目前,世界上 300 套热带轧机中有一半是麦斯塔设计制造的。该公司还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和一大批可为全世界服务的产品许可证。1988 年 7 月,首钢出资收购了美国麦斯塔国际工程公司 70% 的股份,使其成为首钢的海外的子公司。

收购麦斯塔公司以后,首钢便用其来推动技术出口。比如,向印尼出口的马士达棒材轧机设备是由麦斯塔设计的,向美国钢铁联合公司技改项目的投标有麦斯塔参与,为美国俄勒冈钢铁公司设计制造钢板矫直机也是由麦斯塔牵头投标和设计的。近年来,首钢出口成套设备技术方面发展迅速,其成功原因之一就是首钢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海外技术公司来促进技术设备的出口。

4. 订立合适的技术转让条款

签订技术转让合同是一件十分复杂、困难的工

作。对于合同期限、许可地区范围及支付条款等均要认真选择,特别是不要让转让条款反过来约束自己,应尽量避免给予对方独占许可权,必须确保转让方能从技术转让中获得好处。如果是通过代理公司代销技术,要防止对方将得到的技术束之高阁,代而不理,反而使自己的技术销路被封锁,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效益。

5. 加强科研与开发

技术出口的源泉在于技术的开发,只有加强了科研与开发,新技术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技术出口也就顺利开展。首钢之所以能在中国冶金界率先实现技术出口,就在于其积极与科研所、大专院校联合开发技术,就在于其广泛吸纳各种人才从事研究开发。现在,首钢在公司内部实行了科研生产一体化,在各大公司和生产厂矿建立了 72 个研究所,同时正在积极与中科院、清华等科研单位开展合作。今后,首钢还应当继续在科研开发方面加强力量,以促进技术更多的出口。(责任编辑 宋义荣)

(上接第 13 页)

域发展的特色。

总的看来,地区倾斜政策应服从于产业倾斜政策,着力于纠正布局的失衡,支持落后地区的开放和开发,将外资更多地引向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从现实出发,我们认为在目前对外开放已开始向多元化、全方位发展的形势下,利用外商投资应结合地区发展特点,坚持内向替代与外向替代相结合的方针,逐步地、有策略地调整外资投入的布局。

具体讲,一是在保证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外资高速增长的同时,按照南段、中段、北段产业结构和资源存量的特点,结合各段中心区域的发展规划,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使南段的结构进一步软化,北段转向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的优先发展,中段则突出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并保证外资投入的结构能够逐步适应这一布局的要求。

二是根据沿江和沿边开放的总体布置,鼓励外资到内陆发展资源开发和加工型项目,逐步改变我国加工能力与资源赋存在地缘上的错位,既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又为沿海地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形成整个国民经济大系统的良性循环。

我们可以将这样一种利用外资布局的思路称之为“北上西进”,即在加快北部沿海地区利用外资的基础上,加大资金和技术产业的发展比重,实现出口替代升级;而在扩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步伐的同时,将外商投资引向提高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能力,实现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也就是说,要借助于“北上西进”的外部力量,实行综合性的替代战略,用布局的优化来推动结构的升级,最终提高利用外商投资的宏观效益。

(责任编辑 蔡德诚)

科技动态

美科学家提出检测地球表面平均温度的思路

据英国《新科学家》周刊 1993 年 9 月 25 日报道,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科林·普赖斯(Colin Price)进行的一项研究认为,地球的平均温度可以由在某一地点的单一的测量确定。这项研究是根据麻省技术研究所的厄尔·威廉斯(Earle Williams)去年的建议进行的。威廉斯认为,全球闪电活动的数量取决于全球平均温度。

闪电和地球表面温度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对流联系的。地球表面温度愈高,通过大气的对流就愈强,引起的暴风雨和闪电就越多。

地球的大气圈具有球状电容器的作用,下面是导电的地球表面,上面是导电的电离层,两者之间,普赖斯把它称为“漏电的不导电层”。大雷雨使这个球状电容器充电,因此,一般说,单一测量电离层的电势,就可以揭示全

球大雷雨活动的水平,也就可以反映出全球的平均温度。

普赖斯采用人造卫星得到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论点。因为这些数据给出了真实的全球平均表面温度。考虑到季节性变化,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升高 1℃,使(电离层)电势增加 1 万伏。

由于电势对温度的这种灵敏性,电势就可用以检测地球平均温度的微小变化。但普赖斯似乎也注意到,如果全球气候变化大到某种程度,显著地改变了空气中细小微粒、离子和水蒸汽的数量,那么电离层的电势可能除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外,还可能直接受这些变化的影响。

(刘先曙 编译)